

《中国印度见闻录》考释*

宁 荣

内容提要 《中国印度见闻录》根据曾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的亲身见闻而写于9世纪中叶到10世纪初,是现存阿拉伯文库藏中最古老的中国游记,也是古代交通史上一部重要文献。但因成书年代较早,此书在为后人留下许多颇具价值的自然与人文地理资料的同时,也将许多极具争议的问题摆在了人们面前。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书重新进行多视角的考证,分析其创作背景与特点,研究其历史意义与地位。

关键词 《中国印度见闻录》; 苏莱曼; 艾布·载德·哈桑·西拉菲; 考证

作者简介 宁荣,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阿拉伯语系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083)。

Abstract The book of "Akhbār al-Sīn wa'l-Hind" was written by the Arabic merchants who lived in China then according to their own experiences in the middle of 9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10th century. It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oldest travel notes of China and also a remarkable document throughout the ancient transportation history. It records countless valuable natural and humanistic geographic informations, and meanwhile leaves many disputable problems for later generations due to its early-accomplishment. This paper is a conclusion of a further textural research of the book on its background of that time and its own features as well a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by various angles on the basis of other fruit of their research.

Key Words <Akhbār al-Sīn wa'l-Hind>; Sulaymān; Abū Zaid Hassan al-Sīrā-fī; Textual Research

阿拉伯人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建立过伟大的王朝与城市,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珍宝,为后世科学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尤其是阿拔斯王朝建立后,疆域辽阔,商业经济迅速发展,穆斯林中出现了外出经商的浪潮。由于现实的需要与对知识的渴求,“公元10世纪后的几百年内,穆斯林的学术旅行蔚然成风,盛极一时”^①。他们所著的地理学著作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其中包括马斯欧迪(Al-Masudi)的《黄金草原与珠玑宝藏》、伊本·胡尔达兹卜(Ibn Khurradhbih)的《道里邦国志》、比鲁尼(al-Birūni)的《印度志》等,而《中国印度见闻录》(Akhbār al-Sīn wa'l-Hind)则是现存的阿拉伯文学宝库中最古老的一部中国游记,也是阿拉伯文献中的一部珍贵文献。

一、《中国印度见闻录》的翻译与研究

*《中国印度见闻录》由古代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及艾布·载德·哈桑·西拉菲所著,成书于9世纪中叶到10世纪初,是阿拉伯作家关于中国的最早著作之一。自18世纪以来,本书出现了多种语言的译本,上世纪30年代,本书由刘半农父女合译成《苏莱曼东游记》。本文所引有关内容均出自于埃及黎巴嫩出版社2000年的阿文版及中华书局2001年中文版(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

①纳忠、朱凯、史希同:《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

1673年《中国印度见闻录》一书唯一幸存手稿被叙利亚阿勒颇的柯尔柏(Colbert)图书馆购得,之后转让给塞尼莱(Seignelay)伯爵图书馆,接着又被收入皇家图书馆,即现在的巴黎国立图书馆。此手稿由四卷组成,前两卷的笔迹出于同一人,于公元1199年(伊历596年)完成抄录,后两卷与本书无关。《中国印度见闻录》共分两卷,首卷由一个名叫苏莱曼(Sulaymān)的阿拉伯商人所著,尾卷为尸罗夫^②(Siraf)的艾布·载德·哈桑·西拉菲(Abū Zaid Hassan al-Sīrā-fī)所撰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续编(al-Kitāb al-thānī min Akhbār al-Sīn wa'l-Hind)。

1718年雷诺多(Relnand)以《九世纪两位回教旅行家印度及中国游记》为名发行的法译本为该书的最早面世本;1811年,东方学家朗格勒(Langlés)发行了该书手稿的阿文版本;另一位东方学家雷洛(Renaud)于1845年发行了带有注释的法文译本并附有“绪言”。他在“绪言”中指出,雷诺多将本书描述为两位回教旅行家的游记是不准确的,因为只有商人苏莱曼漂洋过海,记录了沿途的风土人情,尾卷作者尸罗夫的艾布·载德·哈桑·西拉菲只

②尸罗夫的遗址位于塔昔里港,北纬27°38',在公元977年被一次地震毁坏之前,一直是前往印度和远东贸易的大转运港。

不过是一个地理学爱好者，他向尸罗夫的商人和水手们打听了一些有关中国和印度的见闻，并将这些并非躬亲经历的见闻进行了分类，附到了苏莱曼所记文本之后；1922年，费琅（G.Ferrand）发表了附有大篇幅“绪言”的法译本；1948年，索瓦杰（J.Sauvaget）将本书的首卷翻译成法语并附有“前言”和注释，他还对原文做了勘校，“不论译文还是注释所取得的成果，较诸以往任何版本都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①。

上述几种译文的前言和注解中皆含有精辟的见解和细致的观察，译者们还将本书与类似的阿拉伯航海地理文献相比较，令读者受益匪浅。除此之外，他们根据参考资料加入了一些重要信息，并为两本书的每一段都附加了标题，使读者更易于了解全书内容。这些译者还对书中提及的山脉、地理位置、海洋、飞禽走兽、植物、饮食、金属珍宝、香料、布匹、两书作者所使用的方言、所提到的地理名称以及旅途细节等进行了大量的考证。

二、对《中国印度见闻录》的考证

该书因成书较早，手稿首页遗失等原因，留下诸多难解之谜。几个世纪以来，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不懈的考证，尽管如此，学术界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考证书名

该书书写有标题的首页遗失，手稿存页标题为《历史的锁链》。索瓦杰之前的三位法国译者都表示认可，但索瓦杰和现在大部分研究此书的学者都矢口否认，认为它与文章内容毫无关系。至于该书的题目，则公认为《中国印度见闻录》，因为续编的作者艾布·载德·哈桑·西拉菲在续编的前几行中明确写有“《中国印度见闻录》尾卷”等字样。

（二）考证作者

续编的作者无疑是艾布·载德·哈桑·西拉菲。按照惯例，作者姓名应写在卷首，但由于该书首页脱落，我们无法确知正文作者为何许人也。曾有人假设作者是马斯欧迪，其依据是：这一著作与马氏的创作风格非常相似。但雷洛和费琅以及更多学者认为该书作者便是书中提到的“商人苏莱曼”。而

索瓦杰对此提出质疑，他的理由是：（1）全书许多段落使用第一人称，而当讲到苏莱曼时却使用了第三人称“商人苏莱曼说……”。事实上这种写作方式，在当时颇为流行，例如马斯欧迪在《黄金草原》中就同时使用了第一、第三两种人称；（2）该书续编的作者艾布·载德·哈桑·西拉菲没有提到首卷作者的姓名。但我们认为，即便如此，也不能说明这就不是商人苏莱曼的作品；（3）马斯欧迪提到该书时并未提及作者，比鲁尼在引用本书时也只提到了书名，而不像一般惯例那样谈及作者。然而，我们却可从另外一些作家那里得到佐证，如伊本·法基希（Ibn al-Faqih）于公元903年（伊历290年），也就是在《中国印度见闻录》成书约半个世纪后明确指出该书作者为商人苏莱曼。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这部著作应是商人苏莱曼所著。

（三）考证作者籍贯

本书并未明确提出作者的籍贯，但通过他们所记载的内容可进行大致的判断：首先，位于现在伊朗境内的尸罗夫是当时来往于海湾和东亚地区最重要的港口，这样的地区产生商人旅行家绝非偶然，甚至是合乎逻辑的；其次，文中出现了一些使用并不广泛的词汇，两位作者都十分乐意为这些词语做注解，特别是那些非阿拉伯语词汇。索瓦杰在其译文“序言”中指出，书中可发现一些以阿拉伯语方式发音的波斯语词汇，而这两种语言的相互渗透只有在海湾地区或两河流域才会出现，这足以说明作者来自尸罗夫或伊拉克地区；再次，作者总是将其在中国、印度的所见所闻与伊拉克的情况相比较。^②我们在阅读时也会发现，作者在对广州的阿拉伯商人进行描述时，也仅仅关注来自伊拉克而不是其他地区的商人，如“此人行使职权，做出的一切判决，并未引起伊拉克商人的任何异议”^③。“当时从伊拉克去中国和印度的商人络绎不绝”^④。在写到中国、印度水量丰富时，作者也提到，这两国不乏比他们的两条大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更宏伟的河流。由此可粗略判断这两位作者是来自伊拉

^② “كتب في ذاكرة أخبار الصين و الهند ”: محمد سطاتم الفهد، <http://www.albayan.ae/servlet/Satellite?cid=1120218348208&pageName=Albayan%2FArticle%2FFullDetail&c=Article>.

^③ 苏莱曼、艾布·载德·哈桑·西拉菲：《中国印度见闻录》（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页。

^④ 同，第95页。

^① 优素福·沙鲁尼编，苏莱曼、艾布·载德·哈桑·西拉菲：《中国印度见闻录》（阿文版），埃及黎巴嫩出版社2000年版，第9页。

克及尸罗夫地区的。

(四) 考证成书时间

《中国印度见闻录》尾卷的作者艾布·载德·哈桑·西拉菲在“前言”中明确指出,本书“首卷”的写作时间是伊历237年(约公元851~852年),但未曾提及“尾卷”的写作时间。不过,他在续编中提到了中国的农民起义(即黄巢之乱)。马斯欧迪于伊历332年在《黄金草原》中援引了艾布·载德·哈桑·西拉菲关于黄巢之乱的描述并认为该起义应发生在伊历264年。在《中国印度见闻录》正文成书100年后,马斯欧迪正值青年,他拜访过垂暮之年的艾布·载德·哈桑·西拉菲,由此可以推断,艾布·载德·哈桑·西拉菲撰写续编的年代是在伊历3世纪末或4世纪初。

(五) 考证书中内容

阿拉伯人自从发现了季风的奥秘,便可向远东航行,除了那条穿越中亚的著名的“丝绸之路”外,他们还拥有“海上丝绸之路”(也称“香料之路”或“瓷器之路”)。这对于善于经商、勇于探险的阿拉伯人来说,无疑是打开了一扇财富之门,阿拉伯的香料、樟脑被带到了中国、印度,中国的丝绸也源源不断地涌入阿拉伯世界,商人水手们成年累月在旅途中奔波。究竟《中国印度见闻录》中的内容是来自于商人还是水手呢?有人认为该书所述情况应该是转述自商人之口,而非水手。因为水手应该对海洋、海岸和港口有一定了解,但他们看到的只是一片熙熙攘攘的港口景象。只有商人在穿越大洋后才会长期居住在某一国家,他们的讲述中有很多关于国家内部情况的描述。《中国印度见闻录》即是如此,其内容多关注所到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等情况。如“根据城市的大小及各王的名望如何,国王的名称也不尽相同:在一个小城市里,城中之王被称为刺史,意思是‘城市的卫护人’;像广府这样的城市,城中之王被称为‘太傅’”^①。再如经济方面,“国王本人的主要收入是全国的盐税以及泡开水喝的一种干草税。在各个城市里,这种干草叶售价都很高,中国人称这种草叶叫‘茶’(Sakh)。”^②此外,还注意到“中国死了人,要到第

二年忌日才安葬,人们把死者装入棺材,安放在家中,尸体上面堆生石灰,以吸收尸内的水分,如此保存一年。如果是国王,则尸体放入沉香液和樟脑里。亲人要哭三年,不哭的人不分男女都要挨棍打,边打边问他:‘难道对死者你不悲痛吗?!’”^③长年奔波在海上的水手,是不可能了解到这些情况的。

三、“见闻录”的创作背景与特点

(一) 创作背景

在国运昌盛的阿拔斯王朝时期,阿拉伯人生活富足,思想开化,对外来新鲜事物充满好奇。阿拉伯人的三条著名航道(穿过印度洋通往印度、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驶向东非海岸的航线,及中世纪的罗马海即地中海航线)又为他们进行海上贸易或航海猎奇创造了条件。各种航海故事、地理文献也应运而生。正如索瓦杰所言:“我个人认为这三部著作,即《中国印度见闻录》、《印度珍奇志》以及《航海述奇》,其主要特点是消遣性。这种作为茶余酒后消遣的作品在伊拉克千千万万市民中是十分流行的。这种书的作者与其说是在写严谨的学术著作,倒不如说是在满足社会各阶层的好奇心。舒适的市民生活以及和外界文化接触的正常发展,在社会名流的怂恿与新鲜事物的刺激之下,其结果必然在一些‘有地位人物’的心头激起一种寻求新奇的渴望,致使有才华的作家(如伊本·法基希及前面提到过的马斯欧迪等人)也不得不为满足顾主们的心愿而写作。并在巴格达开办了地道的‘读者之家’,激起一种寻求新奇的渴望。”^④可见,这本书的创作初衷仅为消遣之用,但该书的两位作者在创作时态度严谨、观察细致,创作了一部可信度极高的地理学著作,为后来地理学著作的创作、历史及地理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创作特点

1. 真实性。凡历史书籍均需考证其真实性,看其是否客观地描述了所反映的历史事件。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一种倾向,即认为《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记载的东西都是不可信的。我们虽不会贸然否认这种观点,但只要细心阅读,便不难看出,如此评价这部文献是不公正的。《中国印度见闻录》

①苏莱曼、艾布·载德·哈桑·西拉菲:《中国印度见闻录》,第16页。

②同,第17页。

③同,第15页。

④同,第16页。

续编中涉及到了路人皆知的黄巢之乱，并称由于此次叛乱“中国的情形，以曾经在那里主宰一切的王法和正义为发端，全都变样了；从尸罗夫港到中国的航运也中断了”^①。马斯欧迪在《黄金草原》中也写道：“但从前（黄巢之乱之前）的情况远非如此，当时中国的船只就驶往阿曼、锡夫拉、法儿斯和巴林海岸、乌布拉和巴士拉，而这些地区的人也直接航行中国。”^②这些记载与我国唐代贾耽在《皇华四达记》的“广州通海夷道”^③中所记载广州至巴格达的海上交通互为印证。《中国印度见闻录》还写道：“在商人云集之地广州，中国长官委任一个穆斯林，授权他解决这个地区各穆斯林之间的纠纷；这是照中国君主的特殊旨意办的。”^④我国典籍对此也有记载，如宋代朱彧的《萍州可谈》卷二：“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⑤索瓦杰对编者所持批判吸收的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还在为该书编写注释过程中尽力举出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中国人、欧洲人相应的证据以资对比，从这些资料与该书所述情况的一致性中便可看出本书是具有真实性的。他说：“除少数几处微不足道的疏忽之外，书中没有什么可以责难的东西。”^⑥并认为在阿拉伯的著作中，本书仅凭它对中国和印度记述的丰富多彩和翔实可靠这一点，就应毫不犹豫地给它以最高的荣誉。我们进一步观察该书的文辞也可看出其真实性。费琅曾认为这本书编写者的阿拉伯语水平很差，这样的评价也是不恰当的。因为这些见闻是由

许多不同的人物口述而成的，作者所遵循的语言风格便是陈述者的语言风格，原书直接收集叙述者亲口所说的语句而未加任何修饰，故语言虽朴素无华，但平易中不失其真实性。

2.文学性。“见闻”一词指一系列的故事，以一个确定的主题展开，因这些故事是由作者从各个讲述者那里收集汇编而成，故条理较紊乱。该体裁在伊历3世纪广为流传，是汇集传说的典型方式。《中国印度见闻录》便采用了这种写作方式，“其中既有喜闻乐见的故事传说、风土人情，也有关于中国地理的科学记述”，^⑦其语言更接近口语而非书面语。此种文体虽不如诗歌、散文中的文字值得玩味，但文简而意达，能够更明晰、准确地对所述对象进行描画以及分析。索瓦杰指出，本书多变的写作风格明显是受了为他们提供信息、材料的那些讲述者的语言风格的影响。

3.正文与续编的比较。《中国印度见闻录》两位作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对异族文化的态度。正文全篇都表现出作者对陌生国度的关注，通过对饮食习惯等方面的描述来比较这些国家与作者自己国家的相似与相异处，认为那些与伊斯兰国家相似的风俗习惯才是令人满意的、明智的（在正文也就是“首卷”中，就不乏这样的比较），但仍能客观地记述下这些风俗习惯，留待读者作判断。如“中国人不讲卫生，便后不用水洗，而是用中国造的纸擦。中国人吃死牲畜，还有其他类似拜火教的习惯。实际上，中国人的宗教和拜火教相似。女人的头发露在外面，几个梳子同时插在头上：有时一个女人头上，可多达二十只象牙或别种材料做的梳子。男人头上戴着一种和我们的帽子相似的头巾。”^⑧至于“尾卷”也就是《中国印度见闻录》续篇的作者，做法却大相径庭。他语言尖刻，不时带着鄙夷的口气，做出武断的判断，认为只有他的信仰才是唯一正确的，多次提到一些阴暗面的东西：“到了最后，那些输到身无分文的人，由于意志薄弱，或为了追求虚荣和虚张声势，竟至常常拿自己的手指来打赌。”^⑨“印度人深信，这样做善事，就能亲近他们

①苏莱曼·艾布·载德·哈桑·西拉菲：《中国印度见闻录》，第95页。

②马斯欧迪：《黄金草原》（耿升译），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2页。

③[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43下《地理七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26页。贾耽在这里将“广州通海夷道”分为东西两条航道：东航道从广州起碇后，途经门毒国（今越南芽庄）、古笮国（越南庆和省一带）、过马六甲海峡，到罗越国（马来西亚半岛南部）、佛逝国（苏门答腊巨港）、诃陵国（爪哇岛）、婆露国（苏门答腊西岸）、狮子国（斯里兰卡），再西行到提罗卢国（伊朗河巴丹）、乌刺国（幼发拉底河口的俄婆拉），最后抵达末罗国（伊拉克巴士拉港）；西路自广州起碇后，到阿拉伯沿岸、亚丁湾和红海地区，终点仍到巴士拉港。

④同，第7页。

⑤[宋]朱彧：《萍州可谈》，载《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第103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90页。

⑥同，第17页。

⑦秦惠彬：《伊斯兰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7页。

⑧同，第11页。

⑨同，第125页。

的造物主——真主，比这些无知妄为之辈所说的造物主，远为高超”^①等。

4.以商人的视角来观察。作者苏莱曼是一名商人，他和续编的作者在学习这本书的时候都没有把它当作一部文学作品看待，他们是以惯有的商人视角来观察中国和南海诸国的一切新奇事物的。因此，这本包罗万象的地理学著作里没有精确的地理学研究，也鲜有对当地文化状况的具体描述。中国文化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迥异，两位作者并没有感到惊讶，而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但他们对中国、印度的商品却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对商品、货币和交换方式的关注超过了任何其他事物，连篇累牍地向阿拉伯人介绍着域外珍奇。可见，这本著作的重要特点在于，“(这些阿拉伯人)是以商人的眼光来衡量和取舍他们的所见所闻的。因此，这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籍，其中包含了不少新的东西，甚至有些内容是在正史中无法见到的。”^②我们也认为，这是一部有着很高商贸价值的地理学著作。

四、“见闻录”的历史意义与地位

(一)“见闻录”的历史地位及重要性

1.《中国印度见闻录》写于9世纪中叶到10世纪初，是阿拉伯人关于中国的最早著作之一。作者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时期阿拉伯人西起东非海岸、东至中国广东这一漫长印度洋航线上的壮观景象。本书根据曾旅居中国的阿拉伯商人的亲身见闻写成，是古代交通史上重要的文献之一。“在《马可·波罗》问世前，苏莱曼的《东游记》^③与比鲁尼的《印度游记》一起，是欧洲人了解和研究远东地理的最重要的参考书。”^④就连索瓦杰也认为：“《中国印度见闻录》所提供的史学价值就目前看，是任何别种著作所不能比拟的，这部著作比马可·波罗早四个世纪，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现存最古老的中国游记。尽管本书在阐述上有缺点与不足之处，但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被视为阿拉伯文献中的杰作。”^⑤

①苏莱曼、艾布·载德·哈桑·西拉菲：《中国印度见闻录》，第127页。

②卢苇：《中外关系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页。

③即《中国印度见闻录》。

④许晓光：《天方神韵：伊斯兰古典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9页。

⑤同，第27页。

2.对当时水手和商人们的指导作用。这部文献对我们了解历史颇有裨益，然而，它的作用远不止于此。它以翔实的记载为当时往来于印度洋两岸的阿拉伯水手、商人，特别是尸罗夫的商人提供了一份相当实用的航海指南。如根据《中国印度见闻录》我们就可以推算出当时航行所需时间。

自巴士拉至马斯喀特需时两个月；

自马斯喀特至故临(Koulam)^⑥需时一个月；

自故临至箇罗国(Kalah)^⑦需时一个月；

自箇罗国至占不牢山(Pulocham)^⑧需时一个月；

自占不牢山至广东需时一个月。

因此，不包括在港口停靠的时间，整个航程需要6个月的时间。此外，书中还述及从海湾经印度洋和马六甲海峡到中国的航线上，有哪些地方可以泊港，需要多少天航行，在何地补充淡水，还涉及到浅滩、强风、吃人种族居住的岛屿等。这些记载对往来船只的领航人大大有益；而关于各地土特产(如龙涎香，麝香等香料药物)的记载，对前往的采购商也是一份大有用处的货单。更难得的是，书中不仅介绍了各种商品，而且对当地的货币和交易方式的记述亦颇详细。在谈到尼科巴群岛的龙涎香、椰子等特产时，说明了岛上居民只用铁器交换土产。这便告诉人们：要去尼科巴群岛购买土特产，如不带铁器去，那就什么也买不到。可见，《中国印度见闻录》决不是凭空虚构的，而是一部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与现实意义的作品。

3.对了解历史的裨益。这本书中出现了诸多地名，这对我们了解那个时期的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地理环境大有帮助。如书中提到了在很早以前，波斯、阿拉伯和中国的海员便穿越了印度洋(古代阿拉伯航海家和地理学家称之为大东海)，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根据岛屿所在位置确定其名称，其中包括我们

⑥现在地图上的Quilon位于印度西南海岸，《岭外代答》及《诸蕃志》称作故临。

⑦阿拉伯地理学家所述的箇罗国提出了一个历史地理学上的微妙问题，根据我们现有的孤立的文献资料，这个位置难于明确解决，尤其是在很多情况下(正如“见闻录”一书)，这一名称与其说是某一确指的地点，倒不如说是半岛上的整个马六甲地区。

⑧据贾耽“通四夷道”：“……又南三日至占不牢山，山在环王国东二百海里中。”占不牢山即占婆岛，是和与江口相对的一个小岛(见《交广印度两道考》第198和199页)在岷港东南，环王国即占婆(占城、林邑)。

现在熟知的波斯湾（阿拉伯湾）和阿曼湾等，如果能对这部文献进行更周密的调查研究，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参考东南亚各地的历史资料，进行比较研究，那就不仅有助于考察当时东西方海上交通的实况，而且对研究印度及东南亚各国的历史也是极有益处的。

（二）“见闻录”对其他阿拉伯历史著作的贡献

阿拉伯地志作家总是习惯于抄录前一二个世纪的作品，《中国印度见闻录》便与当时及后来一些阿拉伯地志学家的著作产生了暧昧不清的关系。如伊本·胡尔达兹卜的《道里邦国志》及伊本·法基希于伊历 290 年（公元 993 年）也就是《中国印度见闻录》成书半个世纪后所作的《列国志》(Kitāb

al-Buldān)，他们都在自己的书中未经任何改动地抄录了《中国印度见闻录》中的大段内容，但均未提及出处。《黄金草原》的作者马斯欧迪坦言，他在写作过程中所用信息直接来源于《中国印度见闻录》续编的作者艾布·载德·哈桑·西拉菲。其中还有一些内容只不过是《中国印度见闻录》的语言进行了美化而已。所以人们可以在《黄金草原》中发现许多与《中国印度见闻录》极其相似的段落。

卷帙浩繁未必尽现史之真谛，言简意赅意匠亦可尽遂。本书以其精粹、求实制胜，映射了一个王朝强盛的侧影，且承载了历史的厚重，其独特价值不容漠视。

（责任编辑：杨 阳 责任校对：李 意）

•••••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阿拉伯谚语）

* 本刊所用阿拉伯文书法作品均选自《陈进惠阿拉伯文书法选》，特此致谢！